

□ 张亚东 胡培兆

经济增长方式的几个认识问题

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时,有些方面容易引起误解或忽视,因此就不能全面把握和推动转变。在此,我们提出五个问题加以讨论。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转变孰重孰轻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和“九五”期间经济工作的着重点。于是,有人认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关键之关键,是重中之重,而经济体制的转变被置于次要地位。这是一种误解。澄清这种误解,首先,在总体上要认识到,我国长期以来单纯追求经济速度和数量、忽视经济质量和效益、效率,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本身,而在于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经济体制的转变列为“一”,而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列为“二”,在总体上就说明了谁是关键的关键、谁是重中之重了。其次,必须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从实际出发,不能笼统地断定孰轻孰重。实际的情况是,改革开放18年来,两个转变在全国范围都在进行着,只是经济体制转变的绩效大一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绩效小一些,即两个转变的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在一些地区如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偏小,经济体制转变较快,经济体制转变的绩效大于国有经济比重偏大的地区。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转变较快,如广东;一种是转变较慢,如福建。所以,可以近似地说,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快有慢之别。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经济体制增长方式的转变一般都比较慢,但也不是绝对的,两种转变可能是均等同步的。就一个省来说,也有地区间的差异,此快彼慢的情况总存在。因此,在经济工作中就要以正确的态度处理孰轻孰重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分三种情况具体对待:(1)两个转变一快一慢的情况下,要以加快转变慢的一方为重点;(2)两个转变双慢的情况下,可以以经济体制的转变为重点,因为经济体制转变快,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较快,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具备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可以加快;(3)两个转变双快的情况下,应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重点,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前提条件,它转变快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更加快些。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投入人会减少吗

外延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以追求数量、规模、速度、产值为目标的,其实现手段主要是依靠资金、物资、劳力的投入,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而对于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效率重视不够。

内涵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则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更新改造、管理合理化、生产集约化以及人的素质的提高,来求得经济增长的。当增长方式转变时,就有一种误解,即认为外延粗放型讲投入,内涵集约型不讲投入或可以少投入。实际情况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行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也需要大量投入,两者的差别不在于要不要投入,而在于投入的方向和效益。从以下几个方面可见,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也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1. 从技术进步上看。内涵型增长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据日本技术厅 1994 年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1200 家民间企业活动的调查和研究后认为,中国居优势地位的技术仅占 0.2%,已成为日本竞争对手的技术只有 1.9%,三五年后可望成为日本企业竞争对手的技术有 35%,七八年后也无法赶上日本的技术占 60.7%。要改变这种技术落后状况,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投资是很大的。据估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本世纪末,技术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应上升到 33—35%,科研经费占 GNP 的比重应提高到 1.5—1.8%。

2. 从效益提高上看。据有关方面按要素生产率计算,在我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中,依靠增加投入增长的部分占 3/4 左右,依靠提高效益的部分约占 1/4,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依靠提高效益的部分一般占 35—40%,发达国家一般占 50—60%。从国有企业来看,在其全部增加值中,依靠提高效益来增加的部分不到 15%。改变效益低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技术、设备进步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措施。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使国内生产总值中依靠提高效益的部分达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水平,也是要大量投入的。

3. 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上看。今后 15 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划已经明确,国内生产总值要求在“九五”期间每年递增速度达到 8% 左右,下世纪初的 10 年,年均增长要达到 7% 左右。从经济的总规模上看,1995 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经济总规模相当于 1980 年的 400%,到 2000 年要求达到 1980 年的 600%,到 2010 年要求上升到 1980 年的 1200%。要实现如此艰巨的任务,需要在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条件下大量投入。

4. 从节约资源上看。按照上述经济增长进度和规模计算,到 2010 年,煤炭的生产需要从 1995 年的 12 亿吨增加到 30 亿吨以上,钢的生产要从 9000 万吨增加到 3 亿吨,石油的生产要从 1.4 亿多吨增加到 4 亿多吨,水泥的生产要从 4 亿多吨增加到 10 亿多吨,木材的生产要从 6600 万立方米增加到 2 亿立方米。无论从我国的资金或资源条件来看,这都是很困难的。唯一出路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如前所述,这也是必须增加投入的。

5. 从人力资本投资上看。1993 年出版的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人力资本的投入特别是初等教育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来源,日本 58%、泰国 87% 的经济增长都可以从小学入学状况的改善来解释。要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大规模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据估计,到本世纪末我国教育经费占 GNP 的比重应提高到 3.8—4%,这也是不小的投资。

可见,两种增长方式都要求投入,因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没有增长。但在投入上两者是有区别的:其一是投入的方面不同。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是以资源、资金、劳力的投入为主,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投入主要是以技术进步、设备更新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其二是投入的结果不同。表现之一是外延粗放型的效益效率总体上会低于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表现之二是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对生产要素的浪费、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会甚于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表现之三是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较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更能增强国际竞争力。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问题

此问题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期性艰巨性问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提出始于前苏联。但是到1990年,前苏联95%以上的产品是国家统一定价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中98%是国有。经济体制转变的滞后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自1956年孙冶方先生提出,经6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不断讨论,至今已有40年历史了。40年来,此问题讨论有大进展的是最近几年。

从前苏联的教训和我国的经济实践来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很难成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到战略高度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保证,但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要注意转变的阶段性。目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以下几个问题要解决:

第一是经济体制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外延粗放、效益效率不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长期实行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所以,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和体制保证。但体制的转变还涉及到行政体制的转变,难度较大。经济体制转变的困难和长期性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难和长期性。

第二是国有企业沉重的历史负担。据典型调查的数据表明,在国有企业“办社会”方面,非经营性资产占企业固定资产的10%左右,非经营性人员占在职职工人数的12%,非经营性费用支出占管理费用支出的40%左右。这些沉重的历史负担制约了国有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是城乡劳动力的转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本有机构成会相对提高,不仅会相对减少吸收新增劳动力的数量,也会出现机器排挤在职职工的现象,使过剩劳动力增多。据估计,到本世纪末,仅农村就有大约1.2亿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问题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制约因素和难点。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难和长期性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能否量化呢?具体的量化要靠计量经济学的专家,这里只能作大致推断:根据一些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约占72%,只有28%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50%到70%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据此,大致到2020年,经济增长中50%左右可以依靠技术进步,即两种方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各占一半;到下个世纪中叶,经济增长中70%以上可由技术进步来贡献,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

四、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集体企业、外商独资或部分合资企业。非国有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多数中小型国有企业将逐步转变为非国有企业,在谈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容易误解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仅是国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忽视非国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据统计,非国有经济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东南沿海则是主要力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村工业企业的增长方式基本上还是外延粗放型的,其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小规模、低技术、主要分布于技术素质要求不高、规模经济要求不高的行业。目前看来,非国有经

济的发展后劲已不容乐观,其外部成本(特别是环境污染)内部化压力将逐步增大,将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因此,采取措施促使非国有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非国有经济继续健康快速增长的根本保证。

为此,首先必须健全产品市场,以有效竞争的产品市场,促进非国有经济进行技术设备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必须健全产权市场,使小规模的非国有经济走向适度规模经济,实现规模效益;其三,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经验,制定《中小企业法》。非国有经济多属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美国、日本等国是技术进步的生力军;制定法律,主要是用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中小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主体,同时还可以起到保护中小企业的正当权益的作用。

五、农业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长期以来其增长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而农业将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期性难点。

在今后5年、15年乃至更长时间里,无论是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产,还是保证农民收入有较快增长,都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九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率要达到4%,农村住房质量要得到改善,这要求大幅度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九五”期间,全国粮食要比1995年增加2500—3500万吨,而粮食播种面积不可能有相应幅度的增加,粮食的增产将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靠实行集约经营。为此,我国农业粗放型增长的特点急需改变。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农村改革,形成有利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为此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经营体制;二是积极培育农村市场体系,形成有利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三是积极推进资源产品化进程,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管理体系。另外,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各级政府要做好宏观调控,实施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的产业政策,加强对农业扶持的力度。

但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也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既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也是其根本途径。只有农业达到一定的规模经营,才有基础和能力的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改变落后的劳动方式。由于全国耕地80%左右用于种植粮食,所以,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难点和重点都在于粮田规模经营,而粮田规模经营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非农产业。所以,非农产业的发展是推进农业规模的基本动力。因为,非农产业的发展能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是推进我国土地规模经营、尤其是粮田规模经营的主要前提条件。非农产业能否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愈发达的地区,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愈大,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愈多,土地规模经营愈易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愈易实现。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单位邮编:361005)